

# 新加坡政治領導層與繼承問題

徐本欽

(新加坡國立大學高級講師)

(本文係作者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廿四至廿六日參加由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的「現代華人地區發展經驗與中國前途研討會」發表的論文。——編者)

## 一、新加坡政治領導層的客觀環境

任何學者認真分析新加坡的政治領袖與繼承問題，必須考慮以下客觀的現實環境。

第一：新加坡不是「第三中國」，新加坡與臺北或北平沒有正式外交關係，新加坡人口有二百六十萬，華人佔七六%，馬來人佔一五%，印度人（包括南亞移民）佔六%，其他屬於他族。雖然華人佔絕大多數，但從東南亞的角度看來，華人只佔二%（東南亞的華人共有大約二千萬人），新加坡的華人是被夾在馬來人與印尼人（一億六千萬人口）的世界中，尤其後者過去曾有排華的暴動事件，故新加坡的華人政治領袖採取政策，尤其是對中國的政策必須考慮到周圍的政治環境，基於這個地理因素，李光耀總理曾不斷的強調新加坡將是東協（ASEAN）與北平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最後一個國家。

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新加坡民族主義的抬頭，反對殖民主義，爭取獨立，絕大多數認真的政黨是多元性種族政黨，這當然包括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成立的人民行動黨，李光耀被選為秘書長，到今日為止，其他早期的領袖包括其他種族，如前總統帝文納（Dewan Nair）在內。

人民行動黨領袖了解到新加坡是一個多元種族社會，每次大選都派出印度人、馬來人、以及混籍候選人，人民行動黨執政以來，內閣成員，也反映了多元種族的色彩。

第二：新加坡是實行議會民主制度（Parliamentary Democracy），憲法規定每五年要舉行大選一次，由於新加坡受過殖民統治超過一百多年，所以受英文教育者佔優越的地位，絕大多數政治精英是受英文教育，例如李光耀曾在劍橋大學法律系畢業，絕大多數受華文教育者，對新加坡政治發展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因為，他們主要的興趣在賺錢、做生意，只有少數人，在一

九五〇年代，加入左翼政黨，從事反殖民運動。新加坡自一九六五年獨立以來，政權一直被人民行動黨中受英文教育的精英所控制。

第三：新加坡地理面積只有六百多平方公里，是一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彈丸小島。因此，當新加坡在一九六五年八月獨立時，很多人懷疑新加坡能否以一個獨立國家而生存下去。

一九九一年，萊佛士 (Raffles) 發覺新加坡有優越的地理位置，處於東南亞中心，東西交通必經之道，適於發展成爲服務經濟 (service economy)。後來華人、印度人移居來此地，落地生根，主要靠勞力爲生，以及經營一些中間人生意。一九六〇年，人民行動黨政府才開始工業化新加坡，成立了製造業的經濟，再加上積極發展各種不同的基層設施，以吸引外來的旅客，於是人民生活從一九六〇年平均每人所得美金六五〇元提高到一九八五年美金七、〇〇〇元左右，換句話說，新加坡已經不再是所謂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而是一個典型物質主義，消費式的中產階級的國家。這種經濟、社會結構的改革，可以說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不必通過共產主義，暴力手段而達到改革的目的。

這種的經濟改變，已經影響到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

第一，所謂新加坡人，新加坡民族主義顯然已經形成，絕大多數人，尤其是年輕人，把新加坡當做自己的國家，這與上一代的華人「生於中國，死於中國」的觀念，截然不同。

第二，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這幾年來對政府的態度有所改變，不大願意接受權威式的領導，他們認爲有權利批評政府，在一九八四年大選，有三〇%左右的選民對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滿。

第三，年輕新加坡人接受多元種族社會的政治現實，換句話說，他們不效忠北平、臺北或新德里或者哥倫坡 (Colombo)，人民接受民主政治、功績主義 (meritocracy)，反對特權主義、共產主義等。

新加坡的政治領導層了解到孤立不是生存之道，新加坡不能採取緬甸式的閉門造車的外交政策，因爲，它位於東南亞中心，東南亞的政治變化，列強在東南亞爭權奪利，衝突必然影響新加坡的政治利益與發展。

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以來，越南、高棉、寮國赤化，越南共產黨擴充勢力侵略高棉，促成中(共)、越直接衝突，蘇聯勢力南伸，在金蘭灣建立海軍基地，插足東南亞，再加上越南難民各處奔逃，影響東協的安全與穩定，在此情況下，新加坡領導層，應採取那一種最佳政策，以使新加坡安全有所保障？

研究政治領袖素質對東南亞政治發展頗爲重要，東南亞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人治不是法治或體制統治 (Institutional Rule)，雖然西方列強自十九世紀在此地區進行帝國主義的統治，建立了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只是表面而已。大體上，東南亞政治領導層多數是權威式 (Authoritarian)，這可從軍人干政看出，緬甸、印尼、泰國，甚至菲律賓軍人對政治發展有舉足

輕重的影響。

從新加坡經驗看來，領袖素質更為重要，人才是唯一最寶貴的資產，因為，新加坡缺乏天然資源，甚至飲用水一部份得從馬來西亞柔佛州輸入，一九五九年以前，新加坡政治動盪不安，共產黨人操縱工會，罷工、學潮、暴動是正常現象，政治不穩定，經濟落伍，社會不安，失業者多。

一九五九年李光耀上臺後，採取德國俾斯麥（Bismarck）鐵腕政策，一方面積極改善人民生活，建立公共組屋，施行居者有其屋之政策，另一方面嚴厲對付共產黨人，華人沙文主義，馬來極端份子，同時改善經濟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為今日亞洲最清潔的花園城市。

從政治發展的理論而言，Fred Fry在其《其精英》一書所提到精英社會背景（Social background）與政治發展的關係，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與政治精英的背景與素質有關，傳統式的精英，由於其傳統價值，必定影響現代化的發展。

以新加坡的例子看來，人民行動黨的政治精英是屬於「現代化精英」（modernizing elite），他們相信韋伯（Max Weber）所談到的理性化（rationality），效能（efficiency）以及爭取現代化的目標，如理性化的官僚等。權力（Power）只是達到經濟改革的一種手段而已，最終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更合理、更公平、平等的社會」，這是一種政治願望，實際的政治現實，會不會實現這個理想，仍是一個疑問？

## 二、以李光耀為首的第一代政治領導層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第一代政治領導層的出現，主要是受到殖民地主義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占領（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的影響，李光耀本人說明日本侵略新加坡是促成他投入政治鬥爭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他是基於理想主義——即反對殖民地主義，爭取國家獨立。李光耀早期的政治信仰不是狹義的新加坡民族主義，這可從人民行動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所提出的政治目標看出，他們所要爭取的是一個獨立，民主非社會主義馬來亞（一九六三年九月成為馬來西亞）。因此，第一代政治領袖多是馬來亞民族主義者，實際上，大多數人民行動黨領袖是非新加坡出生，（例如吳慶瑞，杜進才博士，王邦文等皆出生於馬來亞），人民行動黨的政治目標是通過合併，使新加坡成為馬來西亞的一州。

新加坡與馬來亞合併，只有二年（一九六三—一九六五）。一九六五年八月獨立是歷史的偶然，不是李光耀所能預測到的。從一九五九年人民行動黨的領導層的內閣成員看來，平均年齡只有三七歲而已，李光耀總理本人出身於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執政時只有三五歲，是一位非常年輕的總理。

李光耀主要的同僚，包括黨主席，副總理杜進才博士（出生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廿一日），從政以前，他是新加坡大學講師，曾獲倫敦大學生理學博士，吳慶瑞博士（生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十日）在倫敦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從政以前是高級公務員，「老將」拉惹勒南（S. Rajaratnam）（一九一五年二月廿三日出生）是新聞界出身也是畢業於英國學院，由此可見，人民行動黨的政治元老多數是在英國受高等教育，實際上，早期的李光耀的政治思想受費邊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的影響，在元老之中，只有王邦文是在馬來亞大學畢業，他是搞黨務起家，也是唯一受華文教育的主將。

李光耀的政治思想可以說是「一位實際主義者（pragmatism）以及精英主義者（elitism）」，他反對共產主義，對受華文教育者，存有戒心，不過，他了解到如果沒有受到華文教育者的支持，他就很難把握江山，因此，早期的他願意與親共的林清祥、方水雙等職工領袖合作，反對殖民地統治。

李光耀是一位精英主義的信徒，可從他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在一篇以「亞洲領導層」的論文，發表了他對領袖的看法，在這篇論文中，李光耀提到領袖三個重要的素質：第一，人格（character）；第二，學識；第三，紀律。

李光耀很重視領袖的高尚人格，在他領導下的政府，以剷除貪污，保持廉潔的形象而聞名於世，他「不惜開除他的從事貪污活動的下屬。他認為政府貪污是促成政治領導層垮臺之重要因素。李光耀也曾警告年輕一代有婦之夫的領袖，不得「走私」！他當心性醜聞可能搞垮他的政府，為了維持良好道德形象，李光耀本人，以身作則，過著斯巴達（spartan）生活方式，身心健康，做事有效力，負責任。

由於新加坡是彈丸小島，缺乏天然資源，李光耀很重視人才，一九六五年獨立以後，他就積極的訓練人才，成立國家初級學院，建立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學院，積極培養技術、工藝人才，他認為政治領袖必須要博而精，學有專長。

### 三、李光耀培養第二代政治領導層

由於李光耀長期執政，使新加坡達到經濟成長，政治穩定，使他有精力，時間來培養接班人，實際上，李光耀是唯一東南亞政治家能夠集體培養下一代接班人的領袖，為了擔心新加坡將來的前途，他很認真採取各種不同方法，吸收年輕一代領袖。

在一九六八年大選，他親身提拔了十七位「新血」代表人民行動黨競選，後皆中選為國會議員（新加坡的政治領袖是從國會議員中選出）在此十七位新人才中，以蔡善進律師、黃麟根教授（已經去世）以及李昭銘博士，最重要前二位曾擔任過內政部長，後者曾擔任過教育部長，前南洋大學校長，後來被李光耀開除。

從十七位新人才的社會背景來看，絕大多數是受英文教育，專業人士，官僚出身，技術專家（technocrats），沒有一位是

從黨出身的，實際上，大多數是由黨外直接吸收（co-opt）進來的。有些被派出來成爲行動黨候選人後，才加入成爲黨員（據非正式估計，行動黨有三百位幹部，九千位黨員，是最大的政黨）。

在新加坡政壇中要成爲政治領袖，最捷徑方法是搞好自己的事業，然後被行動黨領袖看中提拔後就可成爲新領袖，在這種制度下，年輕的政客，心理上完全沒有充足準備，再加上自一九六八年以來，政治冷漠，缺乏如一九五〇年代的政治環境，年輕一代新血，缺乏政治訓練、磨練、挑戰，將來不會面對重大政治危機的挑戰，仍是一個疑問？

儘管疑問，李光耀仍繼續提拔人才，在一九七〇年補選中，他選出了五位新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陳惠興博士，他是新加坡大學經濟學教授，陳中選後，被委任爲李總理的政治秘書，一時看來頗有前途，但後因犯下錯誤，被打入冷宮，專心傳教，成爲一位獻身的基督教徒，其他一位重要人才是韓瑞生，出身公務員，爲李光耀知己之一，韓中選後被委爲財政部長，在職期間因心臟病發已離人間。

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人民行動黨黨員大會，李光耀再度強調他有義務要培養下一代的接班人，以取代第一代的政治元老，負起在一九八〇年代末的領導任務，爲了加速政治領導層的新陳代謝，他決定在一九七二年舉行大選（雖然憲法規定政府在位可達五年，但他提早大選，縮短了一年的任期）。

在一九七二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提拔了十一位新血，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王鼎昌，年僅卅六歲，從事政界以前是一位建築師以及城市設計專業人士，王後被委爲全國職總秘書長，成爲工會領袖，他是目前接班人「強人」之一，目前是內閣部長，人民行動黨主席兼第二副總理。

另一位新血是馬來人領袖亞末瑪達（Ahmad Mattar），年僅卅三歲，他是新加坡大學講師，也是學有專長之士，目前的官位是環境部長，他是行動黨政府中代表馬來人利益的部長，人民行動黨是多元性的種族執政黨，所以不能忽視一五%馬來人的利益。

從一九七二年大選候選人的資料加以分析，絕大多數年輕一代的領袖都是新加坡出生，土生土長，在新加坡大學受過教育，然後在外國深造。

在大選後，李光耀開始委任年輕的領袖，首先成爲初級部長（Junior Ministers），例如李昭銘博士被委爲教育部長，瑪達博士被委爲教育部次長，李光耀的用意是使這些年輕人管理政府的機會，那些有良好表現者，後被升爲正式部長。

此外，一九七五年李光耀總理委任陳英樑博士爲國家發展部高級政務部長，蔡崇語爲教育部高級政務部長，王鼎昌爲交通部高級政務部長，這三位新領袖，必須負責他們各部的職務以及參與內閣會議，代表他們各行政部門的利益。

李光耀這種做法是要使政治體系能繼續生存下去，政治精英繼承是政治體系中一種重要的新陳代謝功能，李光耀與其他東南

亞政治領袖不同的特點是他不相信政治繼承是自然的功能，所以，他積極人爲的加以控制這種重要的活動。

他把培養人才當作長遠之計，必須小心翼翼的培養，給他們機會來薰陶，證明他們是國家政治與行政的良才。

在一九七六年李光耀決定加速繼承的程序，決定退休十一位舊血，使十一位年輕有爲之士能進入國會，在一九七二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政府派出了十一位人才，其中以吳作棟、丹那巴南（印籍）最爲特色。

吳目前是李光耀呼聲最高的接班人之一，他是在一九四一年出生，早期在新加坡大學畢業，獲第一級經濟學榮譽學位，後赴美國威廉學院考取發展經濟學碩士，回國後，任職於財政部，成爲該部高級公務員，後來他出任國營船務公司總經理，由於辦事能力強，被李光耀看中，代表行動黨競選，中選爲國會議員，吳氏官運極佳，在短短幾年內，飛黃騰達，官位日升，一九七七年他被委爲財政部高級政務部長，二年後，一九七九年內閣改組，他成爲貿易與工業部長，同年，被委爲行動黨第二助理秘書長（陳慶炎爲第一助理秘書長），成爲人民行動黨年輕領袖中「強人」之一。一九八〇年所舉行的大選，吳氏主管大選事宜，一九八一年他負責安順區補選，在一九八一年內閣改組中，李光耀要考驗他的領導能力，派他成爲衛生部長兼職第二國防部長，一九八三年升爲正式國防部長，控制新加坡國防與安全事務，同時他兼任衛生部長，主管人民行動黨黨務，身負重責。一九八五年內閣改組，吳氏被委任爲第一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成爲年輕內閣成員中第一號人物，其同僚王鼎昌認爲在正常情況下，若無重大錯誤，吳將成爲第二任新加坡共和國總理。

在此次改組中，王鼎昌被升爲第二副總理，王爲華文教育背景出身，據一般人的看法，新加坡是受英文教育精英所控制，華文教育出身的政治精英要成爲總理的機會少過於受英文教育者。

在年輕內閣中，第三位「強人」是陳慶炎博士，他在一九六二年畢業於新加坡大學物理學系，後赴麻省深造碩士學位，又轉入澳洲大學獲博士學位，畢業後曾一度在大學任職，後轉入銀行界服務，從政以前是華僑銀行總經理。

陳氏在一九七九年被委爲教育部高級政務部長，一九八〇年成爲教育部長並主管新加坡國立大學兼南洋理工學院，一九八一年被委爲實工部長，後轉讓此職給李顯龍准將，自一九八五年以來，陳一直是教育部長。

陳慶炎被李光耀重視，爲年輕內閣傑出部長之一，曾一度被委爲行動黨第一助理秘書長，成爲李光耀得力助手，陳給人一般印象是和藹可親，態度溫和，但缺乏魅力（Charisma），從目前形勢看來，成爲第二任總理排名在吳作棟、李顯龍之後。

新加坡以華人佔多數，故非華人要成爲總理可能性不大，在馬來西亞，總理一向是由馬來人擔任，非馬來人不可能成爲總理，種族是決定政治的基本因素之一，所以，馬來領袖瑪達、印人丹那巴南、賈古瑪教授出長爲總理可能性很小，不過，他們將是少數種族年輕領袖，代表非華族的利益。

在年輕的領袖中最引人注目目的是李顯龍准將，他生於一九五二年，今年三十五歲，早期在南洋中學、公教中學、初級學院讀



書，後在劍橋大學畢業，又轉入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回國後就一直在軍隊服務，一九八四年被升為准將。

從政以前，他是一位傑出軍人，一九八四年被推選為人民行動黨候選人，中選成為國會議員，一九八五年新內閣中，被委任為貿工與國防務部長，從這委任看來，他負責兩部重要職位，肯定在今後新加坡政壇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在一九八五年四月，李准將被委為經濟委員會主席，主要職務是要使新加坡經濟復甦（一九八五年新加坡經濟成長率是負一·八%），一九八六年二月內閣改組中，他升級成為代貿工部長兼國防部政務部長，他兼管經濟、貿易、工業、國防，一身數職，說明他是一位政界飛黃騰達的年輕傑出領袖之一。

由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國家發展部長去世，李光耀宣佈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內閣改組，李准將升級成為貿工部長兼管國防部。

除此而外，他的政治地位逐漸加強，這可從他在一九八六年九月成立的人民行動黨青年團看出，他出任青年團主席，青年團主要的任務是要吸收年輕的新加坡人在十七歲至三十五歲之間成為人民行動黨的黨員，以培養將來的接班人。

李顯龍的崛起，毫無疑問的是成為李光耀總理繼承人的強手之一，以目前的形勢看來，繼承李光耀出長總理職位是由李顯龍與吳作棟角逐，其中一人將成為未來總理。

在短期看來，吳作棟成為總理機會較高，因為，他是年輕一代所推選出來的「中鋒」，吳作棟比李顯龍大十一歲，政府與行政經驗比李顯龍豐富，但是，李光耀總理在位越久就對李顯龍越有利，誰是未來的新總理，李光耀下台的時間表（Timing）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李光耀本人曾公開表示要在一九八八年當他六十五歲時退休，這似乎不大可能，他身體仍健康，腦力清醒如舊，仍是大有作為，一般人的看法，他出任總統可能性很大，這可從他公開表示要修改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看出。

在李光耀領導的政府，三〇年以來，財富日增，國庫資產到目前為止，大約有一四〇億美元，在一九七〇年代初，他成立了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成為國營投資公司的主席，此外，政府所控制的淡馬錫控股（Temasek Holdings）曾一度擁有超過五百多間的國營公司，其中比較聞名傑出的有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發展銀行等。

李光耀總理擔心，國家辛苦賺來的錢財，可能會被將來不負責任的政府花光，所以要修改憲法，給總統新權力，換句話說，將來的新總統將有否決權，以否決或不同意新政府動用國家資金的權力，新憲法規定，除非得到總統許可，不然，國家資金不能被動用。

李光耀總理對於未來領袖的要求很高，在一九七七年補選中選有林子安（Lim Chee Onn）和陳天立（Tan Tien Lap）。林子安生於一九四四年，他在哈佛、英國受過教育，加入政界以前是政府高級公務員，李光耀曾公開讚揚陳林兩人為部長人才，中選後不久，兩位被委任為部長，後來兩位表現，沒有達到他的期望而被淘汰，陳林被淘汰說明培養接班人不是一項輕而易舉之

事，除了陳林被打入冷宮外，李光耀也淘汰了陳惠興博士，李總理之政治秘書，陳炎樑博士，一度被西方人士看好，認為可能是李光耀繼承人之一。此外李總理也淘汰了李昭銘博士，由此而見，年輕一代所謂的政治領導接班人的良才，不一定經得起考驗，實際上，不少於廿多位年輕接班人被淘汰。

雖然如此，李光耀不斷的物色人才，這可從一九七九年補選中看出，人民行動黨在這補選中派出了七位新的候選人，其中較重要者有侯永昌，侯不能稱為下一代領袖，他出生於一九二三年，被提拔時已經五十六歲跟李總理同年齡，李光耀選中他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行政經驗，侯為公務員首長，為新加坡政府第一號官僚，李光耀需要他的行政經驗來教導一些年輕接班人如何治理行政，換句話說，在繼承問題上，可能發生了青黃不接的現象，李光耀要年老的領袖退位，但年輕接班人，可能經驗不足，發生錯誤決策，故需要一些有經驗之士，來訓練年輕接班人。

從一九六八到一九八四年李光耀提拔的年輕一代的領袖中可以總結以下的推論：

第一：新加坡一九九〇年代的政治領導層將操在年齡在四十至五十歲之間的領袖，這些人民行動黨的領袖將控制新加坡的政治前途，反對黨要取代人民行動黨政府的機會很小，新加坡政治發展自一九六八年以來就出現了一黨優越制度（Single-Dominant Party System），人民行動黨勢力強大支配整個新加坡政治發展。

反對黨不容易找到優秀的人才，絕大多數的反對黨勢力衰弱，曾一度在一九六〇年初勢力強大的社陣反對黨，沒有復興的跡象，社陣領袖李昭祖醫生，年老體弱，後無繼才，工人黨，新加坡民主黨勢力衰弱，很難取代人民行動黨，但是，反對黨在國會中獲得一些議席可能性很大，新加坡人民，尤其年輕的選民，認識到反對黨的重要性，故此他們認為需要一些反對黨議員在國會中制衡執政黨，以減少執政黨傲慢的態度。

簡言之，新加坡是一個多元種族社會，需要一些反對黨，這是民主政治發展健全的跡象。不過，在這五年內，新加坡要成立兩黨制可能性很小，除非年輕的人民行動黨領導層為了繼承的問題，搞成分裂。

第二：由於李光耀長期執政，最大的影響是促成「企業國家」（Corporate State）的出現。

企業國家主要功能之一是如何促進國家財富，政治扮演賺錢的角色，與多元跨國國際性商業集團，有點相似，在以李光耀為首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將在國外尋找投資機會，使國庫財富增加。

在此制度下，專業技術人士以及公務員（bureaucrats）的權力將增加，他們的權力比國會議員或政客更大，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政策的決定，起重大的影響。

在李光耀統治下的其中一特性是沒沒無聞的公務員可以搖身一變成爲重要的部長，決定國家的前途，在這種制度下，年輕一代的政治領袖可能是「經濟動物」（Economic Animal）而不是政治動物，問題是：如果未來新加坡發生重大政治危機，他們



是否能駕輕就熟，化險為夷？到目前為止，還未出現重大政治危機，故不能肯定判斷他們的政治果敢能力、判斷與智慧，不過，從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新加坡經濟遭受衰退的經驗看來，年輕的領導層，有能力克服困難。

從各方面跡象來看，新加坡政治繼承的問題不會產生重大問題以使新加坡政治發展帶來脫節與政治不穩定的現象，筆者相信政治繼承應該會順利進行，從整個局勢看來，不管誰做新加坡第二任總理，本質上沒有差別，吳作棟、李顯龍兩者皆是專業技術人士，他們都是李光耀領導下的企業國家的產物，他們有其他選擇嗎？他們都必須推行李光耀所擬定的政策，基本上，他們是國家經理 (state managers)，是制度的執行者，李光耀是創業者，因此年輕一代的領導層是政治體系的維持者 (system maintenance)，不過，雖然政策會一樣，但是年輕一代的領袖政治作風可能不一樣，這是因為他們的性格不一樣所致，簡言之，一九九〇年代的新加坡政治發展會有繼續的政治穩定。

曹伯一博士 著

## 中共與中國之適應與衝突

本書從過去的「抗日問題」；現在的「鄧小平政策」；未來的「中國統一問題」；歸結到「中共與中國的適應及衝突」。全書十七萬字，計二五一頁。實售平裝新臺幣一五〇元；精裝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印行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經銷